

桥门市井：北宋东京的日常公共空间

梁建国

内容提要：桥市是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产物，至迟在中晚唐就已出现，至北宋中后期则逐渐成为东京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桥梁，城门也是街市中充满活力与时代气息的商业节点。由于桥门市井原本是下层社会的日常生活空间，在北宋前中期并不被上层社会所关注，所以史籍中少有记载。然而，不同城市阶层通过在桥门市井的日常消费、娱乐等活动实现近距离的接触和了解。伴随着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参与其间，至北宋后期，反映东京桥门市井的文学、艺术作品日渐增多。从城市书写来看，桥门市井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这也折射出社会结构与阶层观念的变迁。原属于底层社会的日常公共空间逐步被知识精英所接受，这无疑是古代城市不断走向文明进步的一种表征。

关键词：桥门市井 北宋 东京 公共空间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城市空间与居民的互动关系是城市史研究的永恒话题。近年来，海内外有不少学者以城市生活的“公共性”作为论题，并以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为基础展开了激烈讨论。^①公共领域理论发端于欧洲近代资产阶级兴起的背景，强调以公众舆论为基础的政治合法性，因而有学者认为在古代中国并无形成类似现代公共领域的可能。^②不过，剥离政治权威合法性这一层界定，作为城市形态概念上的公共空间还是存在着跨越时空的普适性意义。

中国古代都城的功能是以军事和政治为主，这种定位决定了城市居民是以皇室、贵族、官僚、军队以及相关服务人员为主体，个体的工商业从业人员的数量则相对较少。时至唐宋时期，城市社会的居民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官僚士大夫为主体的士人社会向普通居民为主体的市民社会过渡。^③与此同时，中国都城在内部形态上也发生新的变化，由封闭式的里坊制转变为开放式的街巷制。沿街开店得到政府默许，巷陌路口摆摊设点也司空见惯。检索古籍数据库可以发现，“桥市”“门桥市井”“桥门市井”“坊巷桥市”等用语正是在宋代文献中开始经常出现。以燕文贵的《七夕夜市图》、高元亨的《夜市图》、佚名的《夷门市廛图》为代表的风俗画也是在

① 李长莉 《中国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热点与缺陷》，《武汉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② 许纪霖 《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史林》2003年第2期。

③ 宁欣 《从士人社会到市民社会——以都城社会的考察为中心》，《文史哲》2009年第6期。

这样的背景下相继问世。元人王恽评《夷门市廛图》：“近阅夷门市廛图，其风物气习，备见政和间流宕浮靡之俗，然非盛极无以臻此……画品则秾纤巧丽，出内供奉手无疑，正可与《梦华录》互为之览耳。”^①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也敏锐地将虹桥与城门这两处关键的城市节点作为画卷的高潮。

河桥与城门本身是街道的组成部分，桥市、门市与街市也是密切相关的一组概念，三者均是城市商业空间走向开放的产物，但又有些不同。街市的空间形态是线型或网状，而桥市则是团状。关于街市的组织结构，田银生曾提出“中心式区段”，认为大型的酒楼茶坊、寺庙、瓦子勾栏等设施的地段好，具有很强的磁引力，周围地区随之发展起来，形成中心式街市区段，但以酒楼茶坊等为中心的街市区段很难画出一条边缘，缺乏“组织”的感觉。^②这一论述呈现出酒楼茶坊等商业设施的分布形态，但在逻辑上则颠倒了城市地段与商业设施之间的因果关系。街巷的商业化不是均衡发展，特定的路段会比较繁华。街市确实存在稳定的中心，但并不是“逐繁华而居”的酒楼茶坊、瓦子勾栏等商业和娱乐场所，而是桥梁、城门、路口等市政和交通设施。桥梁和城门实际上是路口的两种特殊形态，也是街市中最具商业活力的节点。只是由于其原属下层社会的生活空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被知识精英所关注，史籍中留存的相关史料也有限。相应的，学界以往对于桥门市井的研究也比较少。^③

正如张邦炜所言，与其说宋代是平民社会，不如说是权力社会。^④具体到城市书写的权力，基本上掌握在知识阶层的手里，他们在观察和记述城市现象时难免带有源于阶层属性的主观选择。本文所讨论的桥门市井，关涉城市书写的二重性问题，其一是文本中的城市，其二是历史上的城市，二者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本文拟从城市书写的角度解读文献中的桥门市井，考察其中活跃的不同人群，旨在揭示北宋东京市民社会与日常公共空间的互动关系。

一 桥门近畔的都市繁华

传世文献对于城市的记载大多是上层社会所生活的宫廷、衙署、园林、私宅等空

① 《王恽全集汇校》卷七三《夷门图后语》，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091页。

② 田银生《走向开放的城市——宋代东京街市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136—145页。

③ 张建《〈清明上河图〉中的虹桥市井——北宋东京研究》（《河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结合《清明上河图》中的图像信息与史料，讨论了画中虹桥“桥市”、沿汴“河市”，进而分析了东京城东水门外市井的形成与构成。宋立《浅析北宋时期的汴京河市》（《兰台世界》2012年第24期）认为，汴河沿线舟船、客商络绎不绝，临河逐渐形成为数众多的交易场所，称为“河市”。这两篇文章对于“河市”的讨论，所引用的两条材料均是关于宋代南京（今商丘）“河市乐人”的记载，但翻检宋代东京的相关史料，并没有“河市”这一说法。实际上，临河的交易场所大都是以河桥为节点，因此，宋人称之为“桥市”更为准确。

④ 张邦炜《宋代“平民社会”论刍议》，《历史教学》2017年第8期。

间，而对于路口、桥门的零星记载也多是帝王将相的重大活动。桥门市井在相当长时期内并不被知识精英所关注，所以在史籍中也少有相应的记载。

（一）诗人笔下的河桥景观

中国古代城市多选址于河流沿岸，或者水源丰富的地方，河桥近畔由于交通便利而容易形成市场。北魏洛阳的四通市、东晋建康城的四市、北宋东京的相国寺市场，均是靠近河桥，不过这些大都是封闭的市场，并不被视为“桥市”。真正的桥市应当是桥头、桥面以及桥畔的商铺，特别是流动性的货摊，是一种特殊的街市形态。

桥市是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产物，至迟在中晚唐就已出现。中唐诗人王建有诗《寄汴州令狐相公》云“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①晚唐诗人周繇有诗《津头望白水》云“城郭半淹桥市闹，鹭鸶缭绕入人家。”^②这一时期的城市商业更为繁荣，沿街开店或摆摊设点被政府默许，水门与河桥一带往往商贩云集，甚至出现通宵的夜市。桥市的兴起，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军事或政治型城市的空间结构在商业活动的冲击下开始出现松动。

北宋东京因河而兴，桥梁自不可少。然而，北宋前期的文献中关于桥门市井的记载并不多。《宋会要辑稿》的相关内容可以追溯至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巡护惠民河官员上奏河桥摊贩阻隔人马车乘往来，“河桥上多是开铺贩鬻，妨碍会簪及人马车乘往来”，于是朝廷下诏“在京诸河桥上，不得令百姓搭盖铺占栏，有妨车马过往。”^③可见，当时河桥上多被摊贩占据，妨碍交通，因此被朝廷下诏禁止。但从实际效果看，仍是屡禁不止。宋神宗时，长期主管开封城修造事务的内侍宋用臣征收“地税”或“地课”^④，“以至市桥亦有地税”，这也变相承认了桥市经营的合法性。元丰八年（1085），朝廷又下诏“沿汴官司拘拦牛马果子行并磨团户斛斗、菜纸等诸色行市及市桥地课，并罢。”^⑤加藤繁曾据这条史料以及《东京梦华录》《梦粱录》《嘉定赤城志》《景定建康志》等记载指出，“定期市也在同业商店的街区以及交通便利的河畔、桥畔等处繁盛地举行”^⑥。可以说，至北宋后期，桥市已逐渐成为东京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对于普通的路口，桥的独特之处主要在于其景观效果。比如州桥，构造坚固，镌刻精美，“其柱皆青石为之，石梁石笋楹栏，近桥两岸，皆石壁，雕镌海马水兽飞

① 《王建诗集校注》卷六《寄汴州令狐相公》，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265页。

② [明]赵宦光、黄习远编定《万首唐人绝句》卷三七《津头望白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931页。

③ 《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543—9544页。

④ 包伟民《宋代城市税制再议》，《文史哲》2011年第3期。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三五八，元丰八年七月庚戌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568页。

⑥ [日]加藤繁《唐宋时代的市》，《中国经济史考证》，第1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302页。

云之状。桥下密排石柱，盖车驾御路也。州桥之北岸御路，东西两阙，楼观对耸”^①。桥下潺潺流水，沿河汴柳拂堤。以州桥为中心，形成一个视野开阔、高低错落的立体活动空间。东京城内建筑鳞次栉比，接檐、侵街屡禁不止，城市空间格外局促，州桥一带无疑是京城稀有的开敞空间。特别是月明之夜，“两岸夹歌楼，明月光相射”，登桥观月的人群，纷至沓来，熙熙攘攘，俯瞰河面，波光粼粼，水月交融，被誉为“州桥明月”。直到南宋，时人期盼恢复中原，州桥仍是最具代表性的京城意象。范成大有诗《州桥》云“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②

不单是州桥，其他一些桥梁也是观灯赏景的好去处。比如龙津桥，是御街横跨蔡河的通道，其知名度仅次于州桥。据史料记载“龙津雄壮特甚，中道及扶栏四行、华表柱皆以燕石为之。其色正白，而镌镂精巧，如图画然。桥下一水，清深东流，桥北二小亭，东亭有桥名‘碑次’。”^③李若水有诗云“龙津桥下路，灯火半斓斑。”^④保康桥也位于蔡河之上，苏轼有诗云“保康桥上夜观灯，喝石岩前夏饮冰。”^⑤桥是跨河而建，河水流淌，景色优美，行人在桥上或桥畔驻足观望，生意人也不失时机地前来摆摊叫卖。但是，文献中的河桥景观大都充满诗情画意，而摊贩拥挤、喧闹嘈杂的场景并不常见。能够进入士大夫笔下的多是河畔的高档酒楼，比如州桥附近的王家酒楼。这是一座造酒兼卖酒的正店，规模大、名气响，宋人的诗歌多有提及。刘攽的《王家酒楼》云“君不见天汉桥下东流河，浑浑瀚瀚无停波……提钱买酒聊取醉，道傍高楼正嵯峨。”^⑥梅尧臣亦有诗《十三日雪后晚过天汉桥堤上行》云“堤上残风雪，桥边盛酒楼。”^⑦

河桥经常是作为景观，而非市场出现在宋人的诗歌中，这主要是缘于士大夫的阶层身份及其相应的生活方式和现实关怀。士大夫群体自有奴仆伺候，绝少亲自出入市井，少有机会感受桥市的氛围。桥市作为庶民百姓的日常空间，较少出现在知识群体的视野之中。即使在中晚唐，有关桥市的诗歌也是出自王建和周繇这样贫寒出身的诗人，他们对于庶民群体的市井生活有着切身体验，因而同情百姓疾苦，诗作充满纯朴的生活气息。

唐宋以来，商人的政治地位虽然逐渐提高，但始终不能与官僚士大夫等量齐观，

①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一《河道》，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4页。

② [宋]范成大《范石湖集·石湖居士诗集》卷一二《州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47页。

③ [宋]楼钥《楼钥集》卷一一九《北行日录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105页。

④ [宋]李若水《忠愍集》卷二《受誓戒》，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4册，第679页。

⑤ 《苏轼诗集》卷三〇《碣石庵戏赠湛庵主》，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588页。

⑥ [宋]刘攽《彭城集》卷七，《丛书集成初编》，第190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1页。

⑦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二《十三日雪后晚过天汉桥堤上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46页。

也不能摆脱无商不奸的大帽子。^① 城市空间的等级属性更体现在时人的观念之中，桥市这种底层百姓的生活空间为上层社会所不屑。比如吕公著就教导其子希哲，“行步出入无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语，郑卫之音，未尝一经于耳，不正之书，非礼之色，未尝一接于目”^②。囿于传统的礼法观念，至少在北宋中期以前，出入市井并不被士大夫所认同。活跃于桥门市井的人群主要是底层百姓，桥门市井呈现的不仅是商业景观，更是底层社会的日常生活。因此，士大夫途经河桥之时，对于熙熙攘攘的市井风情即使不视若无睹，也不使用诗文予以记录。

（二）君民共享的城门广场

都市空间不断走向开放与共享是一个总体趋势，这也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西汉长安的宫殿区规模宏大，使得普通居民的生存条件受到严重压抑，而公共活动空间相对有限，至东汉时洛阳已经有空间更为充裕的公众活动场所。^③ 历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逐步演变，隋唐长安宫殿区所占全城面积的比例已经大幅压缩，百姓居住的里坊规模相应扩大。

时至宋代，东京的皇宫和御苑不像唐代都城那样占据绝对中心的位置，而且为商人阶层、商业活动留出更多的空间。即使宫廷区，也开始局部对民众开放。唐朝前中期，长安宫城前的宫廷广场基本是封闭式的，至晚唐时才偶有民众涉足的情况。北宋东京宣德门外的御街也是一个宫廷广场，其与唐长安城的最大不同在于开放式的格局：御街的中央虽然只供皇帝御用，但两旁则可以任由百姓行走。^④ 每逢朝廷赐酺等节日之时，士庶百姓还可以在御街上一边观看文艺表演，一边购买日常百货。史载：“自楼前至朱雀门张乐，作山车、旱船，往来御道。又集开封府诸县及诸军乐人列于御街，音乐杂发，观者溢道，纵士庶游观，迁市肆百货于道之左右。”^⑤ 这虽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也混杂了娱乐、商业等世俗的内容。在沸腾喧闹的气氛中，皇帝、官僚、庶民等各个阶层一起参与到节日的狂欢之中，达到普天同庆、君民同乐的效应。在京城举办酺宴的地点，多是在宣德门城楼之下，其北侧的宫城是戒备森严的国家政治空间，其向南则延伸到百姓的日常生活空间，便于朝廷与庶民沟通互动，因而成为观酺活动的理想所在。与宣德门类似，东华门也是连接宫廷内外的场所。比如上元、中元节，皇帝亲临东华门观灯。殿试发榜之日，人们聚集在东华门外，等待发榜唱名，“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⑥。

① 姜锡东《宋代商人和商业资本》，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67页。

② [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八之一，《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48页。

③ 王子今《西汉长安的公共空间》，《中国历史地理理论丛》2012年第1辑。

④ 梁建国《朝野之间：宋代父老与国家秩序》，《第三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日〕久保田和男撰，郭万平译《宋都的宫城前空间：关于开封宣德门与御街、御廊的比较都城史考察》，《都市史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久保田和男《宋代开封における公共空間の形成》，《宋代史から考える》，东京，汲古书院，2016年。

⑤ 《宋史》卷一一三《赐酺》，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699页。

⑥ [宋]王钰《默记》卷上，《全宋笔记》第4编第3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135页。

作为宫城的正南门，宣德门外广场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因为民众在此守候可以拦截宰相并上诉民情。景祐元年（1034），京城东边的畿县连遭水旱之灾，畿县的百姓“诉其县，不听；则诉于开封，又不听；则相与聚立宣德门外，诉于宰相”。通过这种方式畿县的灾情被传达到宰相，从而派人到诸县调查，“尽蠲畿民之租”^①。对于庶民而言，宣德门前可能是他们能够面见宰相的为数不多的空间，这也彰显出宫门广场所承载的公共属性的稀缺性。

唐代以前的市场主要分布在外郭区，而且有固定、封闭的交易场所。北宋东京的市场则渗透到内城，而且突破了固定市场的限制，深入到坊巷路口、河桥、城门等空间。有学者曾注意到，北宋东京的城门在经济层面的功能更加明显，其里城城门与商业区的联系直接而紧密。^②更为重要的是，城门外广场上的市井气息分外浓郁。《东京梦华录》载：

东华门外，市井最盛，盖禁中买卖在此，凡饮食、时新花果、鱼鰕鳖蟹、鹑兔脯腊、金玉珍玩、衣着，无非天下之奇。其品味若数十分，客要一二十味下酒，随索，目下便有之。其岁时果瓜，蔬茹新上市，并茄瓠之类，新出每对可直三五十千，诸阁分争以贵价取之。^③

东华门可以说是宫廷与世俗社会对接的通道，各种物资由此进入宫中。东华门外市场的主要客户是禁中，因而定位高端，所卖物品以“新、奇、全、贵”著称。东华门外的大货行街则是面向大众的专业市场，往东与著名的商业街市马行街相交。据研究，北宋东京有九条主要的街市，^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九条街的所有路段是同等繁华。东京的商业网点亦有层次之分，大致是由内城向外辐射，与圈层式的人口分布相辅相成。^⑤具体来说，商业中心位于内城东南部，以相国寺为核心，沿着周边的大街小巷及河桥，外溢到几座重要的城门如丽景门、保康门、阊阖门、朱雀门等处。

这些重要的商业中心在节日期间热闹非凡，成为士庶购物狂欢的场所。关于宋仁宗、神宗时期都人节庆游乐、消费的重点区域，吕希哲的《岁时杂记》有载：

鼓扇百索市在潘楼下，丽景门外，阊阖门外，朱雀门内外，相国寺东廊外，睦亲、广亲宅前，皆卖此物。自五月初一日，富贵之家，多乘车萃买，以相馈遗。^⑥

东京潘楼前有乞巧市，卖乞巧物。自七月初一日为始，车马喧阗，七夕前两

① 《欧阳修全集》卷六六《送王圣纪赴扶风主簿序》，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965—966页。

② 万晋《门之内：城市社会空间视野下的都城城门考察——以北宋东京城为中心》，《南都学坛》2010年第2期。

③ 《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一《大内》，第41页。

④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25—335页；田银生《走向开放的城市》，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78—85页。

⑤ 梁建国《北宋东京的人口分布与空间利用》，《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2期。

⑥ [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一《送鼓扇》，《丛书集成初编》，第108册，第235页。

三日，车马相次壅遏，不复得出，至夜方散。其次丽景、保康、闾阖门外及睦亲、广亲宅前，亦有乞巧市，然皆不及潘楼。^①

宋徽宗时的情况基本类似，《东京梦华录》载：

正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士庶自早互相庆贺，坊巷以食物、动使、果实、柴炭之类，歌叫关扑。如马行、潘楼街，州东宋门外、州西梁门外踳路、州北封丘门外及州南一带，皆结彩棚，铺陈冠梳、珠翠、头面、衣着、花朵、领球、靴鞋、玩好之类，间列舞场歌馆，车马交驰。^②

七月七夕，潘楼街东宋门外瓦子、州西梁门外瓦子、北门外、南朱雀门外街及马行街内，皆卖磨喝乐，乃小塑土偶耳。^③

在孟元老眼中，节日的城门外洋溢着诱人的商业气息，就连富贵人家也乐此不疲。

伴随着城市空间的拓展，士庶的活动范围由内城延伸到外城，乃至城外，而这些活动大都集中在重要的城门附近，越是临近城门的地段越是繁华。京城四大名苑分布在外城的四大城门之外，由于位置特殊、环境优美，成为朝野士庶举行送别等社交、礼仪活动的场所。^④ 城门不仅承载着京城内外的人员往来与经济联络，也丰富了都人的日常生活空间。

都城的空间用地是稀缺的，如何提高空间的利用效率，既考验朝廷的管理智慧，也折射出城市发展的文明进程。唐代以前，都市中能够为市民提供活动的公共空间相对匮乏，宫廷广场、皇家御苑均是禁地，庶民不能涉足，私家园林、别墅则为达官显宦等统治集团的成员所专享，寺院、道观虽对庶民开放，但毕竟是宗教活动场所。这种情况到晚唐以后开始出现局部的改观，宫廷广场在特定时段对庶民开放。时至北宋，这种开放进一步扩大。金明池等皇家御苑每年春天有一个多月对庶民开放，御街广场几乎完全对外开放，寺观中出现更多的世俗活动。相对来说，桥门市井、坊巷桥市这类公共空间的开放程度则最高，任何身份的人群均可涉足其中。当然，这对于底层百姓的意义更为重大，因为高官显宦还有私享的活动空间，诸如宅第、别墅等，而没有住宅或者居住条件差的下层官员和庶民，则更倾向于到桥门市井活动。

二 桥门市井活跃的人群

唐宋以来，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不断松弛，更多的农民由乡村走进城镇，由小城

^① 《岁时广记》卷二六《乞巧市》引吕希哲《岁时杂记》，《丛书集成初编》，第108册，第300页。

^② 《东京梦华录笺注》卷六《正月》，第514页。

^③ 《东京梦华录笺注》卷八《七夕》，第780—781页。

^④ 梁建国《北宋东京的士人送别》，《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

市迁入大城市。据施坚雅推测,在1100年,华北近百分之三的人口居住在都城开封。^① 东京居民人数增多的同时,人口结构也相应发生变化,庶民百姓所占的人口比例远超前代,城市社会的平民化色彩愈发浓厚,市民的概念也随之扩大。正如包伟民所言,到了宋代,市民、市户、市人等概念已成为城市居民的代名词,而不仅仅是指中唐以前那些被著录于市籍的从事工商业的特殊人户,这是因为宋代市场的范围扩大到了整个城区。^② 宁欣也指出,市民阶层的涵盖比较广泛,士人阶层与普通居民在精神文化、日常娱乐、社会生活等方面也有了更多的交流和融汇。^③ 那么,值得追问的是:不同阶层是在什么类型的城市空间中如何实现这些交流与融汇呢?笔者认为,正是在桥门市井这样的场所,通过日常的消费、娱乐等活动实现近距离的接触和了解。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桥门市井真正成为不同城市阶层共处、共享的日常公共空间。

(一) 桥门附近的人群聚居

住宅与市场交错杂处是北宋东京城市空间的一项重要特征。桥门市井之所以成为一种市场形态,也是基于河桥与城门近畔所聚居的居民及其日常消费需求。时至北宋,河桥与城门所附载的居住属性愈发凸显。《挥麈前录》载:

李文定本甄城人,既徙京师,都人呼为“濮州李家”。李文和居永宁坊,有园亭之胜,筑高楼临道边,呼为“看楼李家”。李邯郸宅并念佛桥,以桥名目之。陈文惠居近金水门,以门名目之。王文贞手植三槐于廷,都人以“三槐”表之。王文正本北海人,以“青州王氏”别之。王景彝居太子巷,以巷名目之。王审琦太师九子,以“九院”呼之。张荣僖以位显名,以侍中家目之。贾文元居厢后,宋宣献居[春](宣)明坊,亦以[坊](巷)名目之。^④

关于这些世家望族的绰号,由来各有不同,但大都与当事者具有某种相关性,其中最多的还是缘于当事者居处相关的河桥、城门、街巷、坊里等地标。坊里本是中古时代城市居民的社区单元,中唐以后随着坊墙的倒塌,北宋时期的街巷也具有社区单元的意义,更多地被用来标示城市空间。^⑤ 河桥、城门这些公共建筑与居民生活构筑起紧密的相关性,并在城市空间上具有了人文地标的意义。

桥是河道与街路的交汇,水陆交通便捷,吸引着众多官宦。《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孟元老云“仆从先人,宦游南北,崇宁癸未到京师,卜居于州西金梁桥西夹道之南。”^⑥ 《东轩笔录》卷一三载“王朴为学士,居近浚仪桥,常便服顶蓑帽,步行沿

① 施坚雅著,叶光庭译《导言: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9页。

② 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24—330页。

③ 宁欣《从士人社会到市民社会——以都城社会的考察为中心》,《文史哲》2009年第6期。

④ 《挥麈前录》卷二,《全宋笔记》第6编第1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第29—30页。

⑤ 梁建国《北宋东京街巷的空间特性》,《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⑥ 《东京梦华录笺注》序,第1页。

河，以访亲故。”^①蔡京的赐宅也位于汴河的一座桥畔，该桥因此被称为“太师府桥”^②。桥畔容易形成一定规模的聚居区，居民的消费需求进一步吸引各种商贩前来摆摊开店，形成繁华的市场。州桥堪称京城最繁华的地段之一，两岸店铺酒楼繁荣，笙歌连成一片。《东京梦华录》载，州桥往南，“街东车家，炭张家酒店，次则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李四分茶”^③。州桥一带可以说是东京城最大的桥市。从州桥往南，过朱雀门不远即龙津桥，也是水陆交通的交汇之处。蔡河主要是漕运陈、颖、许、蔡、光、寿等州的粮食，虽然在数量上低于汴河漕运，但能使京城西南各州县粮食等物资达于长江流域，又能把京城西南各州县的交通连贯起来，其航运价值并不低于汴河。蔡河附近商肆画舫云集，各种饮食小吃遍布桥头路口，与州桥夜市连成一片。可以说，桥市的形成是城市交通、商贸、居住与消费等多种因素相互联动的结果，桥市的周边也往往是居民与商贩的混居区。

无论是政府对于城市设施的建设，还是民众对于日常生活的安排，城门无不被作为考量的因素。在居住空间向城外疏散的趋势下，毗邻内城城门的区域受到时人的青睐，成为官员云集之地。^④诸如景龙门、旧封丘门、天波门、阖阖门、旧曹门、旧宋门、朱雀门等重要城门外，莫不如此。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内城土地异常稀缺，建筑及人口密度接近饱和，存在火灾的隐患，卫生条件恶化，生活的舒适度随之降低。

贫富混居是北宋东京的一个空间特征。史籍所载的住宅位置大都是有关高官显宦或名人雅士，但从一些零星的记载可以窥见，这些区域也聚居着不少普通百姓。比如旧曹门外，“朱家桥瓦子，下桥南斜街、北斜街，内有泰山庙，两街有妓馆。桥头人烟市井，不下州南。以东牛行街、下马刘家药铺、看牛楼酒店，亦有妓馆，一直抵新城”^⑤。朱雀门外的大街小巷，也分布着不少民居、妓馆和茶坊。酒店、妓馆的存在，表明人口的聚居及其潜在的社会需求。《东京梦华录》载：

御街一直南去，过州桥，两边皆居民。^⑥

出朱雀门东壁亦人家，东去大街麦秸巷、状元楼，余皆妓馆，至保康门街。

其御街东朱雀门外，西通新门瓦子，以南杀猪巷亦妓馆。以南东西两教坊，余皆居民或茶坊。^⑦

朱雀门东西两侧分别有保康门和新门，三条南北大道与蔡河相交，路网密集，交通便利，居民众多，商贩云集，堪称外城最繁华的区域。

① 《东轩笔录》卷一三，《全宋笔记》第2编第8册，郑洲，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100页。

② 《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一《河道》，第24—25页。

③ 《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二《宣德楼前省府宫宇》，第82页。

④ 梁建国《北宋东京的住宅位置考论》，《南都学坛》2013年第3期。

⑤ 《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二《潘楼东街巷》，第164页。

⑥ 《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二《宣德楼前省府宫宇》，第82页。

⑦ 《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二《朱雀门外街巷》，第99—100页。

城门附近的居民还包括僧尼道士等宗教人士，他们也参与市井生活。关于北宋东京寺院的分布位置，有学者曾考证指出：从整体上看，城南部多于城北部；内城里则东西部较均衡；新城外则西部多于东部；地位高的寺院，多接近皇宫；风景或形胜地带，多为寺院密集区。^①透过这种表象还可以看到，北宋东京的寺院位置存在一个向城外转移的趋势，后来修建的寺院大都位于外城，甚至是城外。更关键的是，不论位于外城还是城外，这些寺院大都选址于城门附近，比如仁和门（旧宋门）外东北的福田院和万岁院，固子门里的法云院和开化院，^②仁和门北的惠明寺，丽景门外的景德寺，^③等等。

不仅是寺院，比较著名的道观也多选址于内城的城门外。周世宗时建的建隆观在大梁门外街北，宋太宗端拱初年建的上清宫在朝阳门内道北，^④宋真宗时营建的玉清昭应宫位于天波门外以东至景龙门（旧酸枣门）外以西，^⑤宋仁宗天圣六年始建的西太一宫位于顺天门外八角镇，^⑥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修作的上清宝篆宫位于景龙门外路东，与景晖门相对。^⑦

对于东京寺院道观的分布，以往的研究主要是对其位置分布进行考订，而没有进一步考虑选址背后的人为因素。实际上，寺院、道观位置或是由其住持、道长等宗教首领选择，或是由朝廷赏赐。选址靠近城门，而不是深山荒野的僻静之处，这当然是考虑到交通的便利。自唐末五代以后，佛、道二教均趋于世俗化和平民化。^⑧在儒释道合流的背景之下，佛道士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世俗社会的活动中，俗世之人也热衷于到寺观之中祈福、游观，这些在寺院道观的选址上也得到体现。

如果说河桥及城门的建设呈现出官方主导的色彩，那么，围绕桥门所形成的住宅、商业、信仰、娱乐等城市设施则是通过市场选择的方式而生成。总之，桥门生活圈是由朝野上下多重力量共同塑就的城市日常空间。

（二）桥门市井的谋求生计

作为城市建筑，河桥与城门由来已久，而成为一种市场形式，则时至中晚唐才出现，到北宋时已蔚然成风。商品交易具有双向性，买卖双方缺一不可，相互伴生，几乎涵盖所有城市居民。一方面，桥门市井的存在有赖于周边居民的聚居所带来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桥门市井的形成也为小商贩、工匠等人群提供了谋生机会。

市民生活的市场化和社会化是唐宋以来城市发展的历史趋势，个人或家庭的各种

① 李合群《北宋东京布局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2005年，第96页。

② [明]李濂《汴京遗迹志》卷一一《祠庙庵院》，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88页。

③ 《汴京遗迹志》卷一〇《寺观》，第161页。

④ [宋]王应麟《玉海》卷一〇〇，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824页。

⑤ 《玉海》卷一〇〇，第1825页。

⑥ 《长编》卷一〇九，天圣六年三月壬戌条，第2469页。

⑦ 《宋史》卷八五《地理志》，第2101页。

⑧ 刘浦江《宋代宗教的世俗化与平民化》，《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

生活用品与服务需求越来越诉诸市场来满足。特别是饮食业，相当发达。据有学者推测，东京从事餐饮业的户数大概要占全体工商业人口的一半。^①关于东京酒店茶坊的分布，有学者根据《东京梦华录》以及《宋会要辑稿》食货的记载，发现正店一般位于热闹的街坊桥市或者重要城门口的街市的道旁。^②实际上，更能体现北宋东京时代风情与空间特色的并不是这些正店，而是活跃于桥门市井的摊贩。《东京梦华录》对此多有描述：

坊巷桥市，皆有肉案，列三、五人操刀，生熟肉从便索唤，阔切片批、细抹顿刀之类。至晚即有燠曝熟食上市。凡买物不上数钱得者是数。^③

每日交五更，诸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循门报晓，亦各分地分，日间求化。诸趋朝入市之人，闻此而起。诸门桥市井已开，如瓠羹店门首坐一小儿，叫“饶骨头”，间有灌肺及炒肺……更有御街、州桥至南内前，趁朝卖药及饮食者，吟叫百端。^④

是月时物，巷陌路口，桥门市井，皆卖大小米水饭、炙肉、干脯、莴苣笋、芥辣瓜儿、义塘甜瓜、卫州白桃、南京金桃、水鹅梨、金杏、小瑶李子、红菱沙角儿、药木瓜、水木瓜、冰雪凉水、荔枝膏，皆用青布伞，当街列床、凳堆垛。冰雪惟旧宋门外两家最盛，悉用银器。^⑤

从这些记载来看，巷陌路口、桥门市井所经营的主要是餐饮服务业，其特征有以下三点：一是在时间上迎合顾客的需求，每天五更就开始营业；二是小吃花样繁多，价格低廉，走平民化路线；三是食品类别多样，既有生肉等食材，也有半成品或熟食，可以满足市民的不同需求。如此周到完善的服务，培育了东京市民特有的消费与生活方式。靖康以后，南迁临安的开封人对此仍念念不忘。周焯曾回忆说“京师人家日供常膳，未识下筯，食味非取于市不属履”^⑥，可见开封人已经习惯到市场上购买饮食，甚至对此产生了依赖。

北宋时期的商品经济渗透到城市社会的方方面面，市场活动在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具有普遍意义。相当多的城市居民跳出原来的职业、身份的限制，不同程度地参与商品贩卖。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宋代形成一种难以阻挡的“全民经商”态势。其经商群体的构成除职业商人外，尤其是包括了衣食国家的军人、官吏、皇室成员和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宗教界人士。^⑦不过，具体到经商的方式与层次也有所不同，既有垄断市场的大商人，也有温饱线上挣扎的小商贩。其中后者大都是外来流动人口，

① 魏天安《宋代行会制度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96页。

② 宋鸣笛《宋东京公共休闲空间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2003年，第28—30页。

③ 《东京梦华录笺注》卷四《肉行》，第441页。

④ 《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三《天晓诸人入市》，第357页。

⑤ 《东京梦华录笺注》卷八《是月巷陌杂卖》，第771页。

⑥ [宋]周焯《清波别志》卷中，《全宋笔记》第5编第9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159页。

⑦ 吴晓亮《试论宋代“全民经商”及经商群体构成变化的历史价值》，《思想战线》2003年第2期。

他们大多数没有铺面，而是采用推车、挑担、挎篮、提瓶、顶盘等方式走街串巷叫卖，或是在城门、桥畔设“浮铺”经营^①。他们大都是“零细小铺、贫下经纪不系合该行户之人”^②，售卖的多是一般行户不屑于经营的低劣零细商品，对独占批发市场的行会不构成竞争威胁；其商品和技能也不为官府所用，加之本小利微，终日营营尚难温饱，无力承担官府的科索，官府一般不强迫他们入行，因此他们被称之为行外商。^③行外商的营业活动不必经过行会，也不承担官府的科配，因而具有相当的独立性。由于他们所贩之物与国家财政和统治阶层的日常消费关系甚微，所以官府除了征税和派役外，对他们的存在和发展一般不加干预。^④行外商数量应当不少，但由于生存于都市的边缘，不被官方注意。直到熙丰年间施行免行钱法时才有过一次人数普查，据统计，当时东京开封有“杂贩破铁、小贩绳索等贫下行人，共八千六百五十四人”^⑤。由于行外商这个群体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人数统计存在客观的困难，因此其实际人数应该要高于这个官方数据。

伴随着行业分工愈益细密化，对于各种日常劳务的需求应运而生，这些都为外来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东京梦华录》载：

寻常出街市干事，稍似路远倦行，逐坊巷桥市，自有假赁鞍马者，不过百钱。^⑥

倘欲修整屋宇，泥补墙壁，生辰忌日，欲设斋僧尼道士，即早辰桥市街巷口，皆有木竹匠人，谓之“杂货工匠”，以至杂作人夫，道士僧人，罗立会聚，候人请唤，谓之“罗斋”。竹木作料，亦有铺席。砖瓦泥匠，随手即就。^⑦

坊巷桥市既是贩夫走卒、工匠人夫各种行当谋生的平台，也为都人的购物、消费提供了便利。众多的外来流动人口不仅为城市供应了廉价劳动力，他们的日常消费也促进着各种服务行业的产生和发展，因而是城市经济发展的活力之源。^⑧北宋东京有上百万居民，不同阶层的社会地位虽有等级高下之分，但在各种消费和服务的商业化过程中结成了相互依存与共生的城市居民生态链。

除了行外商之外，桥门市井中还存在牙人这个特殊群体。唐代的官私文献中开始

① 《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三《马行街铺席》《诸色杂卖》，第313、373页。

②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四，第7767页。

③ 魏天安《宋代行会制度史》，第96页。

④ 魏天安《宋代行会制度史》，第126—127页。

⑤ 《长编》卷三〇八，元丰三年九月甲子条，第7479页。

⑥ 《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三《杂货》，第410页。

⑦ 《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三《修整杂货及斋僧请道》，第413—414页。

⑧ 胡建华《宋代城市流动人口管理探析》，《殷都学刊》1994年第2期；徐东升《宋代农民流动与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宁欣《由唐入宋都市人口结构及外来、流动人口数量变化浅论——从〈北里志〉和〈东京梦华录〉谈起》，《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夏之卷；宁欣《由唐入宋城关区的经济功能及其变迁——兼论都市流动人口》，《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程民生《论宋代的流动人口问题》，《学术月刊》2006年第7期。

频繁出现“牙人”“牙子”等记载。^①唐宋时期的牙人涉足多种业务，包括奴婢、田宅等交易等，还有生活品的代购。牙人在为客商寻找买主时，先自行买进商品，尔后出售给买主。北宋天圣八年，开封府奏报“京城浩穰，乡庄人户搬载到柴草入城货卖不少，多被在京官私牙人出城接买，预先商量作定价例，量与些小定钱收买。”^②此外，牙人还参与人力雇佣的介绍，“凡雇觅人力，干当人、酒食作匠之类，各有行老供雇。觅女使即有引至牙人”^③。牙人在商品交易过程中提供资源或信息的对接服务，从中获取佣金或差价收益，其在本质上属于社会分工精细化而催生的中介服务行业。对牙人来说，桥门市井是他们谋求生计的平台。王安石变法时推行市易法，牙人开始进入官府，成为“自食而办公事”的胥吏，社会地位陡然提高，甚至可以和官吏相提并论，成为下层半有产者中的食利者。由于经济收入相对稳定，生活殷实富足，牙人“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饮食，不置家蔬”^④，他们虽然仍会活动于桥门市井，但身份已经由谋生者转变为消费者。

不论是行外商，还是工匠、人夫，抑或熙宁之前的牙人，他们大都是城市工商业的最下层。如果说，他们离开故乡来到都城是农民人身依附关系松弛的结果，那么，他们被允许在桥门市井谋求生计则彰显出朝廷对待弱势群体的温情与包容。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市民日常生活服务的社会化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城市社会的良好运转就需要不同身份、不同层次的人群共同来完成。可以说，桥门市井的繁荣正是顺应了市民社会的客观诉求。相对于大相国寺等大型市场，桥门市井充分盘活既有的河桥与城门空间，有效扩充了京城的市场体系，体现了城市空间利用的集约化理念。

三 结语

作为一种城市现象，桥门市井是城市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桥门市井的存在有赖于周边居民的聚居所带来的消费需求，也为小商贩、工匠等底层百姓提供了谋生机会。桥门市井的经营方式灵活，主要售卖廉价的商品，提供便民的服务，正迎合了广大市民的日常需求，因而展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代表着城市商业形态的发展趋势。桥门市井是北宋东京街市中最具时代气息与商业活力的节点，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用地的紧张局面，满足了市民阶层对于城市空间的诉求，映射出庶民百姓在京城生存状态。

① 陈明光、毛蕾《驳佞、牙人、经纪、掮客——中国古代交易中介人主要称谓演变试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

②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第6811页。

③ 《东京梦华录笺注》卷四《雇觅人力》，第338页。

④ 《东京梦华录笺注》卷四《马行街铺席》，第312页。

历史上的城市现象丰富多彩、光怪陆离，而能够为后人感知的城市印象则依赖于知识精英的选择性书写。河桥与城门既是交通要道，又是商业网点，三教九流、各行各业的人或者途经于此，或者消费娱乐。城市空间的这种共享性与开放性使得知识精英有机会亲临平民百姓的生活场景，进而将这些见闻通过文学、艺术等方式表现出来。《东京梦华录》和《清明上河图》这两部划时代的作品以不同的形式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东京的市井生活，折射出平民在城市空间话语体系中的地位提升，高高在上的知识精英开始对社会底层释放出相应的人文关怀。

桥门市井这一概念具有双重性，其一是作为客观的城市现象，其二是作为主观的文本现象。桥门市井被载入史籍具有相当的滞后性，而这恰恰透射出社会结构与阶层观念的变迁。原本属于底层社会的日常公共空间逐步被知识精英广为接受，这无疑是城市文明走向进步的一种表征。

本文系厦门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720181073）、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7—16世纪的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项目编号：17JJD770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梁建国，1978年生，厦门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收稿日期：2017年10月22日